

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次尝试

施炎平

朱贻庭教授的新著《中国传统道德哲学 6 辨》(以下简称《6 辨》)是对自己四十余年中国伦理研究成果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思考整理。该书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学史的梳理整合、反思总结,深入探讨传统伦理的古今传承与创新,思考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化,并试图重建一个具有中华文化“家园”感、又集中体现现代精神文明价值导向的“中国伦理学”逻辑结构和范畴。一

个年过八十的学人能有如此的文化担当、学术精神和研究热情,确实是可敬可佩!

观念、思路和方法

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曾引述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阐述自己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观念和思路方法,并以

此为指导,着眼于揭示和梳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探索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进而创建了以《智慧说三篇》为代表、真善美统一为核心理念的“中国现代哲学”体系。

朱教授对伦理学、伦理学史的认知和理解,和冯契先生的理念十分相契。他深知,属于哲学范畴的伦理学,自然就是伦理学史的总结,而“中国伦理学”则对应“中国伦理学史”的总结。故他在伦理思想

史研究上孜孜以求的是伦理学本身的研究,又在伦理学研究中着力寻找伦理思想史提供的依据和资源。由此塑造并确立自己关于中国伦理学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有三:

首先,他的中国传统伦理学研究不局限于伦理学本身,而是以复合学科的视野和思路,融合哲学的、道德问题的思考,以及文化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探讨和把握中国

传统伦理思想的哲学智慧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十分注意引入古今、中西辩证比较的研究方法,扩大了研究视野,夯实了学术厚度。

其次,他通过辨析“伦理”与“道德”的区别与联系,确立起自己的伦理学观,进而阐述“天人之辨”、“心性之辨”、“义利之辨”、“和同之辩”等对偶范畴的道德哲学论题,为构建

(下转 15 版) ➡

➡ (上接 13 版)

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全盘顺应国内的社会环境,他们在伊利诺伊大学学到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就无法毫无保留、直接有效地服务于所谓“社会需求”。而更让他感到诧异的则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立场:

一个国家花费人力物力来帮助另一个国家发展进步,虽然开始能收获掌声和谢意,但假以时日便仍被那些曾经饱受惠泽的国民视为帝国主义,好像时刻要从他们身上掠夺财富。……(这种敌对情绪)并未因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访华人士的友善态度和杰出贡献而有所减轻。……总是有人假定我们就是带着优越感去教导中国人要“用我们的方式”立身行事。(David Kinley Report to President H.W. Chase, “Some Cursory Observations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Sund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Philippines, China and Japan,” 8 June 1932, *President Harry W. Chase Subject File, 1930–1933*, RS 47/5/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 这段评价饱含同情与无奈,却也提出了美国教育对 20 年代中国的影响甚为有限的疑问。

三

大卫·金利提交了一份清醒严肃的报告。此时恰逢美国“大萧条”爆发期间,伊利诺伊大学随之紧缩财政,接踵而来的还有美国外交政策和公众态度日益深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再加上学校高层对中国(及亚洲)失去兴趣,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紧迫问题,伊利诺伊大学

就再没有为建立与亚太地区的联系而实施新的举措或启动新的计划。1930 年以后,伊利诺伊大学中国学生的人数逐渐减少,直到二战结束后的 1946 年由于中国政府又开始向美国输送大批留学生才得以恢复增长。但这种情形并未持续太久,1949 年后,这一波留学潮便戛然而止。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在冷战背景下形成了长期敌对的状态。在此期间,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成为留美华裔学生的主要输送地,其中部分学生来到伊利诺伊大学。与前面两批中国留学生一样,大部分来自台湾地区的学子都选择攻读理工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只有少数人另辟蹊径学习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其中较知名者如曾经摘取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戏剧学学士,1980)。

到了 1978 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复苏,在经历了近 30 年的隔绝之后,第三次留美潮应运而生。最先来到美国的多为访问学者,直到 1981 年至 1983 年期间,终于有不少公费和自费留学生赴美攻读研究生。伊利诺伊大学不属于全美第一梯队的精英学府,因此一开始并非中国学生的首选。当时,大多数美国顶级研究型高校都对重新获得与中国学术界开展文化交流的机会表现积极,竞相争取最优秀的中国生源,但两国之间的校际交换项目还是进展缓慢。而伊利诺伊大学以其与亚太地区的历史渊源,在中国赢得了开路先锋的美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无机材料专家严东生(1918—2016),曾在 1949 年获得伊利诺伊大学陶瓷学博士学位。他在给时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的斯坦利·依肯贝瑞(Stanley Ikenberry, 1979—1995 在任)的信中写道:

伊利诺伊大学因其在诸多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在中国)久负盛名,校方也一直善于增进各类学术团体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友谊。……我自己也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友,1949 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那里工作到 1950 年。如果能由我负责接待从母校来访的代表团,那对我来说必将是莫大的“荣幸”。(Yan Dongsheng Letter to President Stanley Ikenberry, 12 August 1983, Administrative Subject File, 1932–2005 RS 7/1/7–30, ibid) 严东生于 1983 年给斯坦利·依肯贝瑞校长写了这封信,正式邀请他率伊利诺伊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国。

依肯贝瑞校长接受了邀请,但他没有像大卫·金利校长那样留下文字资料,所以我们无法获知他在中国的见闻和感触。无论如何,1983 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允许自费留学,伊利诺伊大学以其出色的科学和工程专业,吸引了很多中国学生的目光。如同之前的两代留学生,这一批中国学生也几乎全是研究生,他们大多经济拮据,只能想方设法节衣缩食,以便能寄钱回国贴补家用。2000 年以后,随着大批中国学生远赴海外就读本科,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改观。在美国,尤其是 2007 年到 2008 年之后,中国留学生的数量突飞猛进,这也体现了国内中等收入群体的日渐壮大。到了 2013 年至 2014 年,中国留学生达到 28 万人,占美国高校外国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本科生人数大幅增长,几乎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之多。有鉴于此,批评界纷纷谴责美国高等教育将中国学生当成了主要的消费者。事实上,在一个教学和科研面临

财政危机的时代,支付全额学费的中国本科生群体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很多大学,使它们得以继续保持教育平等观念和学术竞争力。但是,在这些受惠于中国学生的高校中,用来帮助中国学生适应不同教育文化理念的相关服务和设施却寥寥无几。(案例请见,Bethany Allen –Ebrahimian,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300000 and Counting,” *Foreign Affairs*)

伊利诺伊大学拥有近 5000 名中国学生,在全美高校中名列前茅,因此成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发展态势的晴雨表,常年占据此类新闻的媒体头条。尽管如此,在与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乃至建立长期联络方面,它反倒是显得踌躇不前。举例来说,某私人基金会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资助一个人文社会科学交流项目,每年在十到十二所中国高校中选定若干学者来伊利诺伊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科研工作,近期却决定予以中止。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校方高层对是否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加强合作,越来越犹疑不决,特别是曾经有一个原定召开于南京大学的所有参加过交流项目的学者的研讨会,原本已筹备多时,却因伊利诺伊大学校方在最后一刻取消而前功尽弃,这样的变故更让该基金会心生疑窦,最终不得不偃旗息鼓。而另一方面,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如美国高校不断深化的财政危机,美国政治文化的二分对立和种族矛盾,以及自身在校园内外的“被种族化”(racialization)处境,无不令许多中国学生不知所措。

早在 1912 年,埃德蒙·詹姆斯校长曾与美国总统塔夫脱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共同担任“美国中华协会”名誉副主

席。他获此殊荣之下的满腔豪情不禁跃然纸上:

我们伊利诺伊大学拥有多名中国学生,足足四五十人之多。他们都能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来充实自己。其中不少毕业生回国后都为社会、为家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Edmund James Letter to Major Louis Livingston Seaman,4 November 1912, President Edmund James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04–1919 RS 2/5/3–3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20 世纪初,埃德蒙·詹姆斯校长及其继任者大卫·金利校长都以其先见之明和独出心裁探索了以美国教育培养中国学生的方式方法,他们开设的英语课程和外国学生办事处都曾有效地帮助中国学生适应全新的文化环境,而这样的良苦用心也为伊利诺伊大学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赢得盛誉。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已经从当初那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一方面在数量上早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在现实中面临的重重困境却又一如既往。毋庸置疑,埃德蒙·詹姆斯和大卫·金利两位校长为了使伊利诺伊大学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完成了太多创举,特别是开创了将教育作为一种“软实力”来影响两国关系的经典案例,既具有筚路蓝缕的先锋意义,同时又凸显出难以规避的局限性。重新梳理这段遮蔽已久的历史,可以在中美关系史、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留学史等多个维度上,发现伊利诺伊大学特有的示范价值,值得我们深入发掘和研究。

(作者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教授;翻译/万若嘉 王羽) ■